

美人的沉沦与帝国的安宁： 西汉和亲

王前程

中国古代不同部族、邦国为求得和睦相处或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达成一种亲善关系，这就是和亲。自蛮荒时代直至清末，几乎每一个王朝都发生过和亲现象，而西汉的和亲尤为引人注目。

—

刘邦几经鏖战，终于建立了庞大的汉帝国。但他没有料到就在他与项羽酣战之际，北方草原迅速崛起了一个令他晚年蒙羞、更令其子孙后代头痛不堪的强悍民族——匈奴。

汉七年（前200），刘邦做皇帝刚两年，便亲率大军北上去剿灭那胆敢入侵汉地的胡人，结果在平城被匈奴大军围困了七天七夜，险遭不测。从此以后，刘邦的自信骄狂中便多了一些无奈：“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匈奴列传》载：面对匈奴的威猛强悍，刘邦只好派刘敬去订立和亲之约：“汉常遣翁主，给繒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即汉朝每年向匈奴进献一定数量和品级的钱粮物资，并常出嫁公主、翁主以和亲，匈奴则不再侵扰汉朝边境。这种屈辱的和亲之约显然会使汉人汗颜，但是为了初建的虚弱帝国的安宁，也只能如此。然而，对于那些被遣送和亲的西汉女性而言，则是如陷万丈深渊的悲惨之行。《史记·刘敬列传》载：刘邦最初准备遣送长公主鲁元去和亲，但吕



后坚决不从,日夜哭诉:“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公主嫁匈奴,无异于弃鲜花于粪土,如何使得?刘邦最终以“家人子”冒充“长公主”嫁到了匈奴。自然,远赴匈奴的还有一些陪嫁的低贱侍女。

这第一个远嫁匈奴的“家人子”多半是后宫里一个出生普通人家的美丽宫女,与“良家子”近似。这位美人远嫁匈奴之后生活怎样?结果如何?史籍没有半个字的记录,连其姓名亦湮没无闻。同这首位远嫁的美人一样,湮没无闻的还有许多其他西汉女性,刘邦之后的惠帝、文帝、景帝、武帝等几代皇帝都有出嫁宗室女或公主以和亲的记录,当然,这些公主、宗室女也多半是假冒品。恐怕正是由于和亲女子都是出身卑贱、无关紧要的普通宫女,加上汉人大多以为和亲之约是有损民族尊严的条约,因而正史不屑于记录或羞于记录其姓名与结果。

然而,毫无疑问,她们的牺牲是巨大而悲壮的。对于远嫁匈奴,西汉女性无不望而生畏,她们必须面对三大恐惧:第一,环境恶劣。在汉人眼中,匈奴之国风沙漫漫,气候酷寒,绝非人类宜居之地,正如桓宽《盐铁论》所云:“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第二,饮食习惯不同。匈奴人整天与牛羊马骡为伍,衣毡裘,住穹庐,食肉饮酪,与吃五谷杂粮的汉人习惯大异。第三,文化野蛮落后。远在周秦时代,中原人就将游牧民族视为野蛮族类。《国语·周语中第二》云:“夫戎狄……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左传·闵公元年》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到了汉代,人们对游牧民族的偏见更是有增无减。《汉书·匈奴传》记大臣季布对吕后说:“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又记武帝时期的使者讥刺匈奴“收继婚”习俗说:“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开头用“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来概括匈奴野蛮落后的文化,班固则在《匈奴传》的最后用“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来总结匈奴人的品性。连主张和亲的温和派人士韩安国也认为:“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自古不属为人。”(《史记·韩长孺列传》)一个柔弱娇嫩的汉地女子,远离家国父母,身赴天寒地冻、风沙摧面之境,衣毡裹皮,食肉饮酪,同“人面兽心”、“不属为人”的“豺狼”为伍,还要面对有悖汉人伦理的“妻后母”的难堪,这本身就意味着悲怆的牺牲。

而这种悲怆与牺牲,对于西汉前期的和亲女子来说尤为深刻。从汉朝建立之初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在长达七十年中,西汉王朝总是以卑下者的姿态主动遣送美女和亲,卑辞恭谨,而匈奴则倨傲无礼,动辄以武力相威胁,那些和亲的美女们在匈奴贵族们的眼中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战利品而已,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怜的汉家女儿连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岂能指望她们劝阻单于对汉家长城的肆意践踏?我们不难想象那些汉家美人在大漠深处的悲哀心境。两千多年了,没有人记得她们的姓名和她们的形象,也没有人知道她们死于何年何月,埋葬在何方何地。

然而,作为和亲国策的牺牲品,历史应该公正地记住她们悲壮的牺牲,应该肯定她们为大汉帝国的安定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她们的远嫁固然没有消除野蛮的侵夺劫杀,但对傲慢的征服者多少能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使匈奴单于“乃少止”。这就为大汉帝国的发奋图强创造了相对平安的环境,为大汉帝国的备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汉帝国的将军们穷追匈奴纵横驰骋在无边草原上的时候,可否想起那些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而沉沦在大漠深处的美人们的不归游魂!

二

汉武帝即位七年后,坚决断绝了和亲之约,汉匈两个民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但远嫁汉家美女以和亲的行动并未终止。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遣送细君公主远嫁西域乌孙王国,目的是为了与乌孙建立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细君公主死后,为了巩固联盟,武帝再遣解忧公主远嫁乌孙,时间大约在太初末年(前101)。

此时的大汉帝国早已今非昔比,威震四方的赫赫声名使得和亲女儿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得不到应有的敬重,更何况远嫁的外邦并非桀骜不驯的匈奴。然而,没有一个汉家女儿自愿去乌孙和亲,因为乌孙“与匈奴同俗”,且远在万里之外。远嫁乌孙的两位公主都带有被迫无奈的性质,她们都是罪臣的子女,必须服从帝国的调遣。细君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建淫乱变态,残暴嗜杀,“凡杀不辜三十五人”(《汉书·景十三王传》)。大约在元狩初年(前122),朝廷缉拿刘建,刘建畏罪自杀,其



封国被废除。可见,元封年间的刘细君早已失去了尊贵公主的身份,她没有任何资本同朝廷讨价还价。武帝恢复其公主名号让她远嫁异国,算是对她的关照,她必须替自己的家族立功赎罪,方能列入皇家成员。而解忧则是楚王刘戊的孙女,刘戊是景帝时期“吴楚七王之乱”的核心成员之一,兵败自杀。尽管景帝后来并未废除楚王的封号,对刘戊的子孙不薄,但作为罪臣的子孙,解忧同样不敢违抗朝廷诏令。就这样,为了汉帝国政治、外交的需要,两个美丽柔弱的公主及其侍女们便含着悲伤的眼泪,先后踏上了遥远的和亲之路。

《汉书·西域传》载:细君公主嫁给乌孙老昆莫(国王)猎骄靡,二人年龄相差甚远,加之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因而极度不适应。在苦闷中,细君作了一首著名的楚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回荡在西域的楚歌唱出了公主无比凄怆的心境,更唱出了汉家女儿对家国故土的深情厚意。所以,尽管实质上是一个惨遭遗弃的赎罪之人,细君却决不会违背汉帝国的意志而损害国家利益。当老昆莫猎骄靡要公主嫁给她孙子岑陁时,公主以汉家伦理断然拒绝;可当汉天子来信令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时,可怜的公主却默无一言,心中的凄悲化作对帝国利益的服从——她嫁给新乌孙王岑陁并生儿育女,以维护汉乌联盟。遗憾的是,公主终归是郁郁寡欢,在乌孙生活了仅仅五六年时间就香消云灭了。

当年少的细君公主沉沦之后,继续巩固汉乌联盟以“灭胡”的历史使命就落到解忧公主身上了。与脆弱忧伤的细君相比,解忧似乎要坚韧得多,她在西域生活了长达四十余年,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并在汉宣帝即位之初,力促乌孙发兵五万,与西汉大军夹击匈奴,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武帝“共灭胡”的意愿,但大获全胜,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许多学者认为解忧公主的和亲贡献要比细君公主大得多,这当然不错。但若论起心境来,又比细君好得了多少呢?她遵从乌孙习俗,三易其夫,关系十分混乱:先是嫁给岑陁为妻,岑陁死后,再嫁岑陁堂兄弟乌孙新王翁归靡,生了三子二女;翁归靡死后,又嫁岑陁之子泥靡,生下一子。这种杂乱的婚姻关系,在汉人伦理中是要被讥嘲辱骂的,叫做

“父子聚麀”。解忧在和亲乌孙四十馀年中,常遣其儿女回长安,自己却始终不回故里,固然与乌孙太后的身份不便有关,但与心中的羞怯又何尝无关呢!

然而,深重的羞怯感终究阻挡不了对家国亲人的深深眷恋。解忧年近七十时,流泪上书宣帝:“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只要我们对照一下后汉班超就不难理解公主的眼泪。班超长期经营西域,年老上书云:“狐死首丘,代马依风。……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汉书·班超传》)一个叱咤风云的汉家英豪尚且希望死在祖国,何况一个孤弱衰老的汉家女儿呢!好在宣帝还算宽仁,“闵而迎之”,可惜两年后公主就真的归葬汉地了。可以说,解忧公主为了大汉帝国的长久安宁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唯一值得慰藉的是她的游魂终归故里,比那香消云灭在异国他乡的细君公主要幸运得多。

这里不能不提及解忧公主的陪嫁侍女冯嫫。这个出身贫贱的女子,后来嫁给了乌孙国的右大将,被尊为“冯夫人”。许多学者认为冯嫫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女外交家,是解忧公主和亲西域的精神支柱,没有冯嫫的努力,解忧的命运不会好于夭折的细君。诚然,这位“穷孩子早当家”的冯嫫聪敏异常,有胆有识,“能史书,习事”,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在她有力的影响下,其丈夫右大将成了坚定的亲汉派。在宣帝神爵年间,冯嫫为汉帝国成功地挽救了一次政治外交危机;解忧公主与其第三任丈夫“狂王”泥靡不和,见狂王“暴恶失众”,便与汉使魏和意、任昌等密谋诛杀狂王。这显然是一次失之审慎的干涉内政行为,结果负伤的狂王骑马逃走,其子细沈瘦(狂王别妻所生)带兵围攻公主等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外交冲突,严重地破坏了汉乌关系。更麻烦的是,这场事变刚刚平息,前乌孙王翁归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乌就屠乘民心不稳而袭杀了狂王,自立为王,并准备率部归顺匈奴。眼看汉乌军事联盟即将土崩瓦解,多年心血所换来的外交成果将功亏一篑。在此紧要关头,冯嫫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前往乌就屠大营晓以利害,终于使乌就屠放弃了背叛汉朝的计划。接着,冯嫫奔波万里,亲回长安向宣帝汇报情况,并斗胆献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乌孙内乱。宣帝委派冯嫫为大汉使节,全权处理西域事务。在冯嫫的积极努力下,汉乌双方最终得以化干戈为玉帛。



一个低贱的汉家侍女,大可不必关心汉帝国的政治,但她却认同汉家文化,以故土作为精神依归,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定的责任,杀伐决断,做了许多男人都做不了的大事。当其主人解忧公主请求回归故里的时候,她是否想过也回到日夜思念的故国家园呢?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冯夫人却难以得到回归故里的恩赐,因为公主身上终归流着皇家高贵的血液,让皇族成员回家顺理成章,而侍女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她只能留在西域继续为帝国尽忠。

三

在解忧公主归葬故里十五年之后,汉帝国又遣送了一位和亲美人,这就是王昭君。昭君仅仅是一名待诏掖庭的“良家子”,即出身清白人家的普通宫女,但她无疑是中国古代和亲史上最负盛名的美人。与冯嫫相比,昭君似乎缺乏那种杀伐决断的魄力,但其和亲效果却十分显著:昭君远嫁匈奴后,大汉帝国迎来了少有的安宁,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汉匈边境“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这个大好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王莽秉政时代。然而,昭君和亲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昭君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这些话题千百年来却争讼不息。笔者以为,无论人们争论有多么复杂,分歧有多么深刻,都应从两大方面来理解和评价昭君及其和亲之行:

第一,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昭君和亲无疑是喜剧。

尽管昭君远嫁之前汉匈关系早已和睦亲善,昭君远嫁之后依然不能左右单于政策的走向,但无法否认昭君在巩固和平成果、加强汉匈双边关系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此,自西汉以降,文人们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汉人焦延寿《萃之益》:“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唐人张仲素《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元人吴师道《昭君出塞图》:“平城围后几和亲,不断边烽与战尘。一出宁胡终汉世,论功端合胜前人。”清人顾景星《王明妃》:“……久戍获归国,病马亦解缰。长安百万户,共道蛾眉强。”真诚的和亲化干戈为玉帛,战争的消散给汉帝国也给匈奴带来了安宁、幸福与富饶,昭君因此被匈奴人尊为“宁胡阼氏”。从此意义上讲,昭君和亲实

乃普天同庆的大喜剧,昭君不愧为女中豪杰、中国古代民族交流史上的奇女子,理应获得各族人民的无限崇敬。

第二,从个人生活的角度看,昭君无疑是个悲剧人物。

昭君出塞时的心情、表现及出塞后的精神状态,《汉书》均未记述。对于昭君出塞,历代文人学士多作悲凉之音,而当代学术界则多作喜庆之论,其依据主要有三:其一,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述了昭君主动请缨之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昭君不满宫廷生活,主动请求远嫁,且妆饰十分靓丽动人,其欣喜之情可见。第二,《汉书》记昭君出塞后与两代单于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受到匈奴上下的尊重,被尊为“宁胡阏氏”,她生有一子两女,均被封王和公主,地位很高,昭君对此应该十分满意。第三,单于一见美丽的昭君,便十分“欢喜”,其相亲相爱的生活,远胜于昭君从前待诏掖庭的孤寂寡欢,正如王安石《明妃曲》所云:“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但是,范晔比昭君约晚四百年,对其“主动请缨”之说历代不乏质疑的声音。今天不少学者考定“《后汉书》关于昭君的记载,实滥觞于《琴操》”^①。而《琴操》为东晋初孔衍所作,是一部解释琴曲歌辞渊源的文献,杂糅了许多民间传说,所记昭君故事并非信史。即便昭君真有“求行”之举,也不能说明昭君是快乐的。《汉书》仅仅记载了昭君在匈奴生儿育女的情况,并不能反映昭君的精神世界。而北宋文豪王安石虽然在诗中发出了“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之类的惊世之论,但他不过是借说昭君故事来申诉自己的不得志,其主题仍然是“人生失意无南北”。因此,这些理由不足以证明昭君的幸福欢乐。

实际上,时代环境的变迁乃是昭君形象出现分化的根本原因。美化女性和亲生活,描绘昭君幸福康乐,主要集中在元代、清代和当代三个时期。这不难理解:元代、清代是少数民族一统中国时期,和亲屈辱的文学基调,哀怨悲切的昭君形象,已经不能适应民族交融的大环境的需要,正如元代诗人虞集在《昭君出塞图》中所言:“天下为家百不

^①参见过元琛《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复旦学报》2009年第3期。



忧,玉颜锦帐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离离咏不休?”当代虽然是汉族主政,但多年来一直倡导、强调民族大团结、民族大家庭的方针政策,追求和平团结的含笑的昭君形象更符合时代的思想理念。客观地讲,塑造喜剧性的昭君形象,确实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然而,这并非历史人物王昭君的本来面目,学术研究同政治需求终归是两码事,较之喜乐欢快的昭君形象,悲怨哀伤的昭君更具有历史真实性。

首先,昭君应是含泪出塞的。

昭君和亲之时,汉强匈奴弱,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双边关系大为改善,匈奴不会也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对待和亲的汉家女儿。但塞外的生存环境并无改变:“毡裘肉食本异俗,不如但嫁巫山村。黄沙白云无城阙,手冷鸱丝夜弹歇。”(高启《王昭君》)恶劣的气候,食肉衣裘的异俗,加之远离家国亲人的孤单,一个娇弱的汉家女儿又岂能不黯然流泪?对此,历代诗人多有咏叹:“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石崇《王明君辞》);“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庾信《昭君辞应诏》);“明妃远嫁泣西风,玉箸双垂出汉宫”(胡曾《汉宫》);“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王安石《明妃曲》);“燕支堤上石榴裙,新草犹含旧泪纹”(潘滋《题昭君图》);等等。这些诗句固然带有文学色彩,但大体符合昭君当时的精神状态。今天多有学者夸大昭君开阔乐观的胸襟,是不切实际的。正如崔明德所言:“从汉匈和亲到唐懿宗第二女安化公主嫁给南诏王隆舜共一千零三年中的112次和亲,没有一位和亲公主是含笑颜出塞或入塞的,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泪水、哀叹和悲伤。……就王昭君出塞时的心态而言,只能是悲伤、泪水,绝不是含笑颜出塞。”(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82页)

其次,昭君远嫁匈奴后内心无疑是压抑的。

昭君出身寒微,善于适应新环境,出塞之后地位又尊贵,生活无忧。从许多民间传说看,昭君与匈奴人民关系相当融洽。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其心情欢畅。飘游万里大漠,对南国家乡的深深思念是不言而喻的:“直欲论情通汉地,独能将恨寄胡琴”(曾巩《明妃曲》);“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偷弹玉箸。未央宫殿知何处,目送征鸿南去”(秦观《调笑

令·昭君》)。而这种情感只能深埋心底,因为与其他和亲女子一样,昭君必须面对“父子聚麀”、“兄弟聚麀”的异俗的尴尬,一个从小生长于汉家伦理环境中的女性,对此绝难泰然处之。为了汉帝国的利益,昭君只能遵从异俗,但她再也无颜见家乡父老:“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石崇《王明君辞》);“汉宫君臣薄,胡人父子轻。……纵有归来时,耻见父与兄”(陈子龙《王昭君》)。这绝非虚言!一个日夜思念家乡亲人的女子,只能默默遥望故乡的星空,其悲凉苦涩的心境可想而知。

再次,昭君和亲并未给家乡人民带来福音。

昭君和亲为汉帝国和匈奴带来了安定和繁荣,也为其家庭赢得了优厚的待遇(其两名亲侄王歆、王飒均被封侯),但并没有给家乡亲族和人民带来荣誉和幸福,相反却带来一种心理伤害。昭君嫁两代单于,同汉人伦理规范格格不入,对昭君家乡人民尤其是王姓亲族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包袱。为了不让昭君悲剧重演,家乡人民就将生下的女儿脸上烙下疤痕。远在晋唐时代,烧瘢毁容的习俗就流行于昭君故里。白居易《过昭君村》:“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遗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王十朋《昭君村》亦云:“十二巫峰下,明妃尚有村。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瘢。”这种陋俗在地方县志中亦多有记录,如雍正版《归州志》:“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炙其面。”由此不难推知远嫁万里之外的昭君的凄怆之情及负疚感是何等的沉重!

在当今学者眼中,昭君是幸运者,她被各族人民所崇敬和颂扬,美名永垂青史。但不能忘记,昭君远嫁和亲之日,便是同父母、兄妹、亲友永别之时,在风雪弥漫中,踏上了遥远的不归之途。这个为大汉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汉家美人,其柔弱躯体沉埋于大漠草泽,其负疚痛苦的灵魂却一直徘徊于关塞烽火,怯生生地凝望着南国的丘山。

历代与家国兴亡沾边的美人,大多身背骂名,如商之妲己、周之褒姒、越之西施、唐之杨玉环,以及小说中的貂蝉、李师师、潘金莲之流,莫不如此。唯有西汉和亲的美人,后人只能报以深深的同情与叹息,因为她们作为和亲的牺牲品,太过无辜!又太过不幸!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